

纪念杨向奎先生百年诞辰

清史论丛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 编

二〇一〇年号

2010
年號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奎先生百年诞辰

清史论丛

2010 年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 编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史论丛2010年号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9.12
ISBN 978-7-5078-3175-7

I. 清… II. 中… III. 中国—古代史—清代—文集
IV. K249.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04296号

清史论丛2010年号

编 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	刘川民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海军政治部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280千字
印 张	20.75
版 次	2009年12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09年12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175-7/K·160
定 价	38.0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清史论丛》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戎笙

杨 珍

李世愉

李华川

陈祖武

张捷夫

何龄修

林存阳

高 翔

郭松义

赫治清

主 编 李世愉

副主编 李华川

目 录

记拱辰先师的一桩未竟遗愿	陈祖武 (1)
勤奋为学 博通经史 兼擅文理 著述宏富	
——纪念杨向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李尚英 (3)
清代的灾赈	郭松义 (18)
明清的使君称呼	
——读《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商榷 (一)	何龄修 (31)
厦门庚子海战引发的思考	王戎笙 (39)
清人笔下的庄氏史案	(美) 白亚仁 (49)
西藏地方历史地位辨析	
——兼评《西藏历史——达赖喇嘛访谈录》清代部分	梁俊艳 (86)
弘历出生地考	金恒源 (104)
康熙帝统治后期对清官、能员的思考	
——以张伯行、噶礼互参案为中心的分析	章文永 (119)
试论清代科举制度中的“发领落卷”政策	贺晓燕 (132)
清代顺天科举冒籍问题研究	王洪兵 (149)

清代乡试覆试考论	邹长清 (169)
万斯同《庙制图考》小识	林存阳 (201)
雍乾之际程朱理学“式微”考察	朱昌荣 (214)
戴震与卢见曾幕府研究	曹江红 (238)
清代礼仪与中西外交	吴伯娅 (257)
耶稣会士汪达洪的在华活动	汤 斌 (268)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中小学教科书里的中国	姚 斌 (280)
清末秘鲁排华风波中的领事保护	王士皓 (291)
论《重校方言》中的“同”与“通”	刘川民 (307)
清入关前满文档案概述	赵志强 (315)

记拱辰先师的一桩未竟遗愿

陈祖武

恭逢拱辰先师百年冥诞，遵《清史论丛》主编李世愉先生嘱，谨奉上纪念文字一则，敬申缅怀悃忱。

20世纪30年代末，徐菊人先生主编之《清儒学案》问世，总结一代儒学，篇幅达208卷之巨。四十年代初，钱宾四先生以徐先生书“庞杂无类”，未尽信史，遂竭一人之力，锐意重修。稿成，竟罹不虞之灾，付诸东流，仅留下《清儒学案序目》一篇。七十年代末，拱辰先师承宾四先生未竟之志，发愿结撰《清儒学案新编》。自1985年2月该书第一卷出版，迄于1994年3月全书八卷出齐，时间过去整整十年。1992年10月，该书完整出版在即，先师特地写下《清儒学案新编跋》一篇，文末记云：“以后如有可能，我将补上本书有关的学术年表及校勘索引等项。”自1982年10月先师撰《清儒学案新编缘起》，迄于《清儒学案新编跋》脱稿，历时亦恰恰十年。常言道十年磨一剑，信然。

先师发愿结撰《清儒学案新编》，已入古稀，全书出齐，则年届耄耋。面对案头八册巨著，先师虽有补撰年表、索引之想，但年事已高，精力不济，故迄于逝世，终未能如愿。

先师晚年，曾经不止一次对祖武谈过，由于《清儒学案新编》在文字校勘上工夫下得不够，以致错误太多，所以想同出版社商量，看看能不能专出一册勘误。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一交涉久久没有一个结果。记得出版社主事先生曾来过一次长途电话，随后就再无下文。设身处地地想，或许应是出版社方面经济压力太大的缘故。

祖武忝为拱辰先师入室弟子，于《清儒学案新编》的结撰，未能始终其事。早期，仅为该书第一卷做过一些资料选辑和文字抄写工作。首卷出版之后，即因《清代全史》、《清代人物传稿》等集体工作的需要，而把相关工作统统交给先师已故助手吴宏元先生。仅凭吴先生一己之力，当然不堪如此重负。因此，《清儒学案新编》文字错讹过多局面的酿成，祖武难辞其咎。愧对先师在天之灵，有负廿余年教养深恩，简直无地自容。

先师辞世十年，经济、社会发展，国家政通人和，已远胜十年前气象。随着国家对古籍整理和研究事业支持力度的加大，先师遗愿已经有了实现的可能。齐鲁书社作为我国一家高素质的专业古籍出版社，如有计划将先师遗著整理再版，祖武不才，尚可驱使，理当为之竭尽绵薄。

勤奋为学 博通经史 兼擅文理 著述宏富

——纪念杨向奎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李尚英

2010年1月10日,是历史学一代宗师、《清史论丛》的创建者和首任主编、我们敬爱的导师杨向奎^①(我们都尊称为杨向老,或向老)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想,在先生一百周年诞辰日到来之际,对他最好的纪念就是学习和宣传他的学术思想,并使之发扬光大。200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编选、陈祖武等学者编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文选·杨向奎集》的出版,为我们深入学习杨向老的学术思想提供了便利条件。我虽然对先生的博大学问了解不深、知之甚少,但还是不揣冒昧地把自己学习《杨向奎集》的一点心得体会写于下面,以表达对慈父般的老师的深切怀念和无限敬仰之情。

一、博闻强记,勤奋为学,著述丰富,成果卓异

杨向奎先生,字拱辰,河北丰润人,生于1910年1月10日,逝世于2000年7月23日,终年91岁。先生1931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从史学大师顾颉刚、傅斯年受业。1935年毕业后,先后执教于甘肃学院、西北联大、东北大学和山东大学,任甘肃学院文史系讲师、教授(时年仅28岁),西北联大副教授,东北大学教授,山东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作育人才,桃李满园。1956年调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第一所(1958年与第二所合并为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明清史研究室主任(“文化大革命”后改任清史研究室主任),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创立后任该院历史系教授、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导师,孔子基金会副会长,墨子研究中心名誉

^① 我于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做清史专业研究生,导师是杨向奎教授。

主任等职。

杨向老一生孜孜不倦地勤奋为学，广泛涉猎于经学、史学、哲学和理论物理学、数学，博古通今，著述宏富，为学术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早在1943年，先生即已发表名著《西汉经学与政治》，受到学术大家顾颉刚、傅斯年等人的称赞。60年代初，《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下两册先后问世，成为学界的畅销书。先生也由此奠定了自己在学界的大师地位。此后十余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先生的学术成果问世较少。“文革”结束后，先生以耄耋之年，精进不已，奋笔疾书，结撰专著《中国古代史论》、《清儒学案新编》、《大一统与儒家思想》、《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墨经数理研究》、《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哲学与科学——自然哲学续编》、《绎史斋学术文集》、《繙经室学术文集》，主持编纂《中国屯垦史》和《百年学案》等15部，论文200余篇，还有为友人和学生作书序数十篇。“文革”时期，先生“躲进小楼成一统”，又以一业已取得卓越成就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而毅然攀登自然哲学和理论物理学的高峰，相继发表《熵和引力》、《论时间空间》等多篇重要论文。环顾四海，古往今来，皆属罕见。先生曾对笔者说：“我的学术成果主要在70岁以后（完成的）”。这是很符合实际的，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杨向老一生为学坚忍不拔的执著精神。

杨向老一生文理兼通，恐怕与他为学经历有关，更为重要的是对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深刻认识有关。

杨向老早在中学读书时，教务主任王先生曾对学生说：“在经学问题上，今文学派说《左传》是一部假书。”还有一位物理教师王硕儒先生也曾对学生说：“我懂得‘相对论’，那是四维。”两位老师的话可能只是随便一说，但幼年的杨向奎听后，心情却很不平静。他想，自己儿童时代只读过一部《左传》，原来还是一部“假书”，心里惊讶不已，总想解开这个谜；他在学习物理时，知道三维，现在老师说有四维，那一维是什么？也想来个刨根问底。总之，这两句话确实影响了杨向老一生。

进入学术研究领域后，杨向老逐渐认识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是探索和研究人类发展规律的科学。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对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就是历史哲学。而物理学是自然科学中的基础科学，是探讨和研究自然发展规律的科学。自然本身是无知的浑沌，人类对自然的研究，使自然有了透明度，自然的透明度又增加了人类的知识，这样相互推进，我们才知道，自然是无限而有界的。当然，每一个星球、每一个天体都有它的起源与衰老，黑洞理论的提出，更可能证明空间与引力的关系，黑洞不过是一个熵洞。^①所以，自20

① 杨向奎：《我对人文科学的看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二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发言》，《杨向奎学术文选》，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25、226页。

世纪60年代以后,杨向老就以一位社会科学家的身份潜心地研究起理论物理学和数学,直至生命终结。他在晚年时说:“现在也很难说,我是以学历史的身份业余地搞物理,还是主要搞物理兼搞历史。因为我有时把主要精力放在物理学上,有时又集中精力研究历史或哲学。这种多元的研究方法,直接影响到我研究项目的进展,不能集中精力搞一方面,就分散了力量。但我即使知道这种多头研究有许多不利的地方,也不想改变,这是多年养成的兴趣,多年的嗜好。……我对这几门学问都很喜欢,丢不开这个,也丢不开那个,只好三头并进,四头并举。”^①实际上,杨向老在这里表达了他的一个关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运用、相互借鉴的深邃而又十分重要的思想,代表了现今科学发展的趋势。

总之,杨向老在他六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就是这样孜孜不倦地研究历史学和毅然攀登自然哲学与理论物理学的高峰,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卓异成就。

二、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扎实的史学资料的完美结合

杨向老是中国史学界中较早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学术问题的学者之一,也是中国史学界中获得学术成果最大、最多的学者之一。杨向老多次教导他的学生说:“研究社会科学,一定要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自然界的发展规律,也必须懂得自然辩证法,掌握了这种方法,再学习有关物理学的基础知识,然后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进行研究、进行提高,这样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当然,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只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学者不相信这种哲学、这种方法,所以他们在研究自然科学中总会遇到一些不可克服的难题。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并不承认自己成就的取得是运用了自然辩证法,但他们成就的获得,往往是、或者是他们的方法符合自然辩证法,如果完全违背自然辩证法,就不可能获得巨大的成功。”^②

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曾掀起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分期和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虽然轰轰烈烈,但由于对唯物史观认识程度的不同,得出的看法大有差异,甚至大相径庭。有鉴于此,杨向老先后发表了《读〈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兼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期问题》、《〈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学习笔记》等理论文章,力图运用唯物史观以解决历史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始于何时?其内部如何分期?杨向老在学习了《家庭、私有制和国

^{①②} 杨向奎:《杨向奎学术·前言》,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2页。

家的起源》和《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等有关理论文章后，强调研究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时，必须关注古代东方和古代中国的特点。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古代东方和古代中国社会经济关系的论述，杨向老指出：古代东方和古代中国的特点，首先是氏族制度和农业公社制度的长期存在。但古老的农业公社制度是否也保存在封建社会内呢？先生认为，“中国历史的特点，不仅表现在初期的奴隶社会内，也表现在封建社会内，尤其是封建社会的前期，显著地保留有很多的自由的农业公社成员”。以往史学界有一种机械的看法，认为奴隶和农奴是互相排斥的，“有奴隶是奴隶社会，有农奴是封建社会；如果有奴隶又有农奴，那就变成一种使史学家迷惘的社会了”，而马克思的“现代家庭”论既包含着奴隶制，也包含着农奴制，“正好解释古史学家迷惘”了。（《杨向奎集》第23-24、12页，以下引用本书时只注页码）

杨向老在《从〈周礼〉推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一文中指出，《周礼》一书在学术上极有价值，它提供了古代东方社会的许多有用材料，我们通过这些材料既可以了解古代东方社会的特点，同时又可了解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难以解决的原因。杨向老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难以解决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认识不足，而往往是以部分代全体，甚或以后来的发展情况说明古代。他还指出，必须对史料加以认真考订。并说：

在战国以前，就黄河流域上下游各国的社会结构来说，如果我们能够对于史料加以严格甄选的话，会发现它们并不是整齐划一地向前发展的。过去我们对于史料的运用太粗疏了，根据西周某一地区的铜器文字而概括地说明当时所有地区的社会性质；或者是对于某一种材料的时代还弄不清楚，而用以判断某一时期社会发展的特色，这全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第99页）

杨向老在本文中仍以大部分篇幅论述了春秋时代的齐国社会，认为“《周礼》是齐国的产物，而《周礼》的制度，在其他齐国文献中是可以得到证明的”。齐国根据《周礼》和其他典籍的记载，至少在齐桓公时已是一个封建国家，但还保存着原始氏族制度；从统治者内部来说，也还保存着奴隶制度。但是，这些奴隶没有从事农业生产的，他们不是农业奴隶；当时有私人奴隶，但不从事农耕。由此先生指出，我们史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史的认识所以统一不起来，往往在于掌握了某一地区某一种材料，就用来笼统地说明各国的社会性质。先生建议，我们应该划分开来研究，要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解决问题，认清了齐国，认清了三晋，认清了宋、郑，认清了秦、楚，认清了吴、越，然后再说明哪一个地区的社会发展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流，这样，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才易于获得圆满解决。（第108-109页）

具体到西周社会性质问题,杨向老认为西周是初期封建社会。先生在《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一文中指出,解决西周社会性质的问题,是解决中国古代历史分期的关键;而要解决西周社会性质首先应当解决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地位变化问题,究竟谁是剥削者,谁是被剥削者的问题。先生认为,西周初年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在统治者和“殷民”的矛盾上,这大批“殷民”是剥削者主要的剥削对象。先生指出,在《周礼》一书中,千言万语环绕着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怎样处理这些“民”的问题,而不是“士”的问题。他还特别强调说,《周礼》所反映的社会不是奴隶社会,而是封建社会;自西周至春秋,凡是记载中的“民”、“氓”、“庶人”、“众人”或者是“农人”,全是指当时被剥削的广大农民阶级而言,他们领有一小块土地,并且有他们自己的生产工具。例如“氓”,就是从事于主要生产事业的人,但他们的地位是农民,他们由领主授田,成为领主剥削的对象;《周礼》中讲的井田制度,实际上“附着于土地上的奴隶和贫困的公社成员,逐渐变为农奴了”。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由于压迫奴隶和管理农民的方式不同,西周出现了以“德”为代表的新的社会意识。“德”字在西周是一个新字,它所代表的也是一种新的思想意识,也是新基础的反映。“德”是用以“和民”的,这“民”也是一种“新民”,“以德和民”是西周以至春秋时代统治阶级的口号(第124-125页)。先生在1980年11月写的《绎史斋学术文集·前言》中再次强调了自己的观点:“现在我……的看法并没有改变,我仍然主张中国封建社会自西周开始,除了古文献的材料外,近年来云南的史学工作者在作了傣族田制与农奴制和周秦社会的比较研究后,同样得出了西周是封建社会的结论。”^①先生的观点得到了学界很多同仁的支持。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历程,杨向老认为可以分为下列四个阶段:(1)封建社会前期,西周至西汉(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2)封建社会成熟期,东汉至晚唐(公元1世纪到9世纪)。(3)封建社会后期,北宋到鸦片战争以前(公元10世纪到19世纪中叶)。(4)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即鸦片战争到全国解放(1840-1949)。中国封建社会前期,是领主经济居主导地位的时期,领主通过公社对农民取得超经济剥削。战国时期以后,地主阶级已经抬头,不过领主的势力并未全肃清。秦与西汉还是领主与地主交哄的时代。王莽末年的农民起义,摧毁了领主阶级,社会向前发展了,中国才走上成熟的封建社会。具体而言,这一时期正是在东汉到北魏时期。先生这些观点同样得到了学界不少同仁的支持。

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性质,也是史学界争论激烈的一个问题。杨向老在6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一书和其他一些论文中,多次对这一

① 《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前言》第1页。

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具体而言，他不同意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的土地国有制一说。杨向老认为，战国以前，我国存在着以井田（村社）为主干的土地国有制；此后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宋以后更成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他还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土地制度方面曾存在过的“种种迷人的假象”，诸如拓跋魏的均田制和唐代均田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对于拓跋魏的均田制，杨向老指出，“均田令实际是对于无主土地再分配的政策。对于无主土地的分配，并不涉及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问题。”而唐朝的均田制，是唐朝政府为了“搜括脱漏户口和土地，为了恢复生产和增加税收”所实行的一种土地制度；况且，实践说明“均田并没有按法令贯彻实行，各人各户的土地，许多是本户的原来所有”。杨向老认为，农民为地主干活，实际上就是交纳地租，如果对他们不实行强制，如果农民对于地主没有人身依附关系，农民是不会干的。所以，“地租表现了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形态，只有结合人身依附关系，才能完整地说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性质”。他还说：“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土地所有权的垄断，而这种垄断的根据是土地私有制。”^①

三、勇于创新 永不停步 不断将学术研究推向深入

杨向老在历史学、经学、哲学、红学、小学等领域均有许多创新，作出了突出贡献，略述如下：

先生在历史学中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尤其是对上古史的重建上。杨向老的多年助手吴锐先生曾说，杨向老贡献最大的“还是对上古史的重建”，“杨派上古史是有成立的基础的”，除了“它的两大支柱即神守、社稷守和炎黄文明”外，还有中国阶级社会的开端、中国封建社会的迄始等。

谈到上古史的研究，不能不涉及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古史辨派”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派，该派着眼于一个“破”字。如杨向老所说：“《古史辨》的功劳主要是对于传说中的古史的‘破’，这一破对于后来建立科学的真实的古代史是有积极作用的，我们不能把盘古开天当作历史！”同时它也有“冲击某些封建权威、某些封建道统的权威”，继承“‘五四’精神的传统，反对封建主义的积极意义”。但也必须看到，他们在古史问题上多“重复过去的老路，恢复到今文学派康有为的立场”，指责汉代刘歆等人伪造《左传》和《周礼》，伪造虞、夏、商、周的古

^① 《杨向奎学述》第78、79页；参见《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90、111页。

史系统(第372、388页)。先生认为,这种观点“是今文学派的偏见。儒家托古改制的说法,只是把他们的理想放在古代,并没有伪造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至少虞、夏、商、周的时代是存在的,我们不能否认这个体系。但今文经学派后来演变成疑古派,他们怀疑虞,怀疑夏,对商、周的许多历史也持怀疑态度。这就未免太过火了,玉石俱焚,这样一来,硬把中国的四五千年的历史变成两三千年历史,这种看法是武断的、没有根据的。无论从古代的文献记载上,还是从考古发掘上,这种理论都是难以成立的。^①

可以说,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下,杨向老以极大的精力重塑上古史。首先,他研究了神守和社稷守的问题。

神守、社稷守是有关中国上古社会实体统治形式的关键问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杨向老继国学大师章太炎之后,发挥了神守、社稷守的理论。他以大禹杀防风氏为例,指出,“防风国”名的出现,说明我国古代在4000年前,曾经存在着神守国与社稷守国。社稷守即后来的阶级社会国家。而神守国时代,即神的时代。防风国以夏禹杀防风氏说,上古之天子居山宾天与人间之媒介,这种媒介在古代称之曰神。先生在六十余年前曾经叙述过夏代南迁的史实,后来多次说明神、巫、史的发展过程。夏是社稷守国,防风是神守国。

杨向老指出,在我国古代文献记载中,属于炎帝系统的姜姓国,齐、许、申、吕虽然在建国规模中比不上黄帝系统的夏、周,但他们的文化水平并不逊于“郁郁乎文哉”的周,或者说,他们的成就是“郁郁乎文哉”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春秋战国时代,楚申文化曾有过辉煌的表现,代表着我国当时的南方文化。楚、申、吕都是曾经称王的国家,它们都是重黎后。重司天属神,后来为申;黎司地属民,后来为吕。于是申为神守国,而春秋时楚之太史都为“申公”或“王子申公”;吕后为社稷守。申司天而吕司地,申司天蓬以圆丘祭上帝,吕司地遂以方丘祭四方。《吕刑》即用以司民者,齐出于吕。^②

杨向老在有关炎黄文明的探讨上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继承和发展了顾颉刚先生关于远古民族的分合,炎、黄不同族,炎是炎,黄是黄的观点。认为姬、姜原不属于一个部落,他们分属两个氏族,各有来源,都是源远流长,各有各的族姓,各有各的图腾崇拜。黄帝、炎帝来源不一,而姬姜两姓原来也并不是一个氏族。华夏族诚然是中华民族中最重要的集团,可以作为中华民族的代表,但不能说华夏族仅由炎、黄两族构成。东夷集团,尤其是殷商,在构成华夏氏族中起了骨干作用,夏、商、周三

① 《杨向奎学述》第9-10页。

② 参见《杨向奎教授论“基础科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0年第2期。

代，或者是虞、夏、商、周四代，共同融合成华夏族。在四代中，虞、商代表了东夷集团，而夏、周代表了华夏集团。我们不能“数典忘祖”，华夏族的形成当先夏而后周，姜羌之与华夏结合也当先夏而后周，这样我们才能析源解流，使许多纠缠不清的问题，各得其解。

在上古史的重建上，杨向老还有一个重要观点不应忽视，那就是有虞氏是我国阶级社会的开始。先生指出，在中国古代史上，虞、夏两代是应当大力研究的对象。杨向老在《应当给有虞氏一个应有的历史地位》一文中，考察了虞、夏两代的世系和当时的生产方式。他认为，有虞氏时代虽然“还是石器时代”，但“已经有了奴隶制的萌芽”，“有关于私有动产的传说”，“在生产上是畜牧业与农业生产的结合”，因此，“有虞氏是不能忽略的一个历史时代，应当在中国史上获得应有的地位”（第133-134页）。

黄河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摇篮，夏禹治水的故事广为流传。但夏在中国的地理位置，多少年来没有人能说得准确无误。有的国学大师认为，夏在中国的西方，杨向老在《大禹和夏后氏》一文中指出：“夏代中世以前，政治中心在今山东省，其势力及于河北、河南；晚期则移居河东及伊、洛流域，然而东方仍有其孑遗。”（第148页）

杨向老在金文、甲骨文研究上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郭沫若先生曾对《国语·周语》中“我姬氏出自天鼋”一句解释说：“天鼋即轩辕也。”轩辕即黄帝，也就是姬氏出自黄帝。杨向老同意这种解释，并从青铜铭文中认出了“玄鼋”这两个字。先生说，天鼋即玄鼋，天、玄古音相同（第218页），从而有力地支持了郭老的正确看法，对探索炎黄文明作出了重要贡献。再如，商朝武丁时的卜辞习惯用语中有三个字，这是自甲骨文字出现以来，聚讼数十年而未解决的问题之一。先生经过详细考证，认为这三字应是“不玄冥”，即指兆璽之不昏暗、不模糊。这一解释，得到了著名文史专家郭沫若的赞同：“其言至确”。

乾嘉学派历来是中国学术思想史，尤其是清代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以往学界总是按地域把乾嘉学派分作吴派和皖派，没有触及到该学派的实质。杨向老早在60年代初就写出《谈乾嘉学派》，提出将乾嘉学派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进行研究的主张，并认为，考据学派的奠基者顾炎武关心政治，以考据作为工具以“明经”，既“通经致用”又阐明“经学即是理学”。但到了考据学派的大师惠栋、戴震时期，发生了变化：与顾炎武相比，惠栋“没有那种爱国主义的热情，没有积极的政治思想”，而戴震更是“干脆丢掉了政治主张，于是考据学派三种内容——政治思想、反理学、考据，变成两种了”。到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以下，“学风已变，他们既不谈政治，也不反对理学，只是考据，清初以来的汉学遂逐渐失去精华，形成一个偏枯的学派”。

先生的上述观点，理清了乾嘉学派的源流、发展变化过程及其性质，堪称乾嘉学派研究方面的杰作（第295-300页）。

杨向老在经学研究上的贡献也是卓著的。经学分为今古文，今文以《公羊》为主，而古文经的重点则是《周礼》和《左传》。

杨向老自1946年进入山东大学工作后，在经学研究上重点研究《周礼》。先生在《〈周礼〉的内容分析及其成书年代》一文中指出，“自从《周礼》得到表彰以后，这部书的真伪及其成书年代，成了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存在问题”，今文学家视其为王莽、刘歆的“伪造”。杨向老在阐释了《周礼》的社会经济制度、政法制度、学术思想和体系、成书的时间与地点以后，指出“《周礼》可能是一部战国中叶左右齐国的书，《大戴礼》曾经引用过它，司马迁、匡衡也引用过它，无论如何不是王莽的伪造”，而且王莽为达到篡夺西汉政权的目的而引用、效仿过“周礼”，同时他本人对《周礼》“还有许多误解”（第190、198页）。杨向老的《论〈左传〉之性质及其与〈国语〉的关系》一文，更是通过精彩而深入的论述，彻底推翻了今文学家视《左传》为“伪书”的臆测，受到当时著名学者莫非斯“精当绝伦”的赞誉。

在今文经学研究方面，《杨向奎集》选编了杨向老撰著的《〈公羊传〉中的历史学说》、《论刘歆与班固》、《〈白虎通义〉的思想体系》、《司马迁的历史哲学》、《论何休》、《清代的今文经学》等论文。上述论文集中论述了公羊学的缘起、内容、发展演变过程。先生认为，《公羊》和荀子属于一个学派，他们是儒家而接近法家。在政治理论上既主张改制，又提倡复古，这未免进退失据而不能自圆其说；思想体系上一方面要维护诸侯割据的旧制度，另一方面又提倡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仍然是无法调和的矛盾。但《公羊》具有进步的历史观，能适当地反映时代要求，反映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最主要的一点是强调大一统。这有助于中国的统一，但在春秋战国时中国并未统一，因此《公羊》只能说是为后王立法。至汉武帝时真正出现了大一统，《公羊》的理想才得以实现。司马迁也是著名的公羊学家，他继承了公羊学的传统，为后王立法：大一统；为后人立法：反对暴政，肯定农民起义，并歌颂货殖和游侠。汉武帝在完成大一统事业后，需要一个导致礼乐升平的具体方案。可是，公羊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的对策都是不着边际、冠冕堂皇的言辞，而无实际内容，这可谓整个公羊学的悲剧。此后，地主阶级由于其政权已经巩固，不再需要讲求多变的公羊学，于是公羊学也就倒退了一步而接近正统派儒家，并参与了儒家宗教化的过程。东汉时，史学家班固撰集《白虎通义》，首先抛弃了大一统使儒家更进一步宗教化。直到东汉末年，经师何休为公羊学作总结，虽然这总结是纸上谈兵，但究竟保存了公羊学原有的义法和理论，才使公羊学重新发皇。先生还对“古史辨派”的“五行相生是刘歆一派的伪造”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五行相生说”先于“五行相胜说”，而这两说均来自邹衍，刘歆当